

中国

争
议

中国
文化
苦旅

小说集

中国争议小说集

主 编 李 博 郑福田
副主编 张静红 武俊明 方泽慧
王秀丽 李 枫

第 四 卷

中国物价出版社

争议话语

对于张洁以往的其他作品来说,《她有什么病?》(刊《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无疑是一个变调和新声。

不消说,它与《爱,是不能忘记的》那类关于爱情、婚姻、伦理道德的作品截然不同。其实,就是同样观照现实的作品,《他有什么病?》也与《沉重的翅膀》在写法、笔法、笔调上迥然有异。前者观照的是民族性和国民心态,后者观照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前者着重于对一些畸形人物的畸形心理的揭示,后者则着重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前者表现为冷峻的解剖,后者则透露着热切的呼唤。前后对照,说明张洁正向着人性和文学的更深层次突进。

阅读张洁的作品,我们常常会感到她作品中有一股强烈的愤世嫉俗、嫉恶如仇的精神。张洁之所以成为张洁,也许正在于此。她的前期作品的抒情也好,议论也好,她的近作《他有什么病?》的冷峻也好,其精神气质的相通之处,正在于充斥全部作品中的愤世嫉俗、嫉恶如仇的感情。

与作者这样的精神气质相为表里的是张洁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挚爱。无论是《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祖母绿》,都分明有一种对美好感情的忆念,对坚强女性的赞颂。即使在《他有什么病?》这样的作品里,读者在跟随作者一道去憎恨那种畸形的心理心态的同时,也依旧能够透过作者所着力塑造的象侯玉峰、陈主任、陈么妹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体会到她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拳拳之心,及对民族对国家的焦灼忧虑之情。

对于《他有什么病?》这类小说有无凝聚点和贯串线这样的疑问,我倒想说点愚见。诚然,小说中没有我们常见的中心人物、贯串的情节线,结构也似乎有些分散,但这并不妨碍作品自有其思想内涵上的凝聚点。依我看来,这凝聚点就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那些阻碍中华民族向着现代化腾飞的情性的心理素质——诸如麻木不仁、封建意识、懒散和满足、贪图小利、精神贫乏、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思想僵化、盲目崇外以及关系学开后门等等畸形的心理心态,有着深切的痛感和极度的义愤。并且正是为了更充分地更自由地表达作者胸中这些痛感和义愤,张洁毅然甩掉了传统的小说模式,而采用幅射式的结构框架,以医院为窗口,以几个人物几件事情作为贯串线,同时向社会延伸推进,最后又一齐凝聚于医院,聚焦于种种畸形的病态。这样写,虽然削弱了作品的故事性,却较大的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淮淮

张洁这回写得很“野”。这两年,有一批作家纷纷“撒野”,女作家也不乏其人。刘索拉、王安忆、铁凝……都一路“野”过来。至于这班人还会“野”到什么程度,实不敢讲。

说“野”，是粗话。细究起来，分明是“变”的一端。张洁这回也变得叫人不敢认。在写法上恐怕是这班人中走得相当远的一个。通篇竟无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主角”，没有贯穿的情节，不再有对个人命运、道德、责任、义务的回顾、阐发。其中有我、你、他三种人称叙述角度，由一家医院与社会构成若断若续的种种联系。飞机晚点，处女膜事件，求一个安稳觉而不得，病人死在电梯门口，“喂”的犯罪式循环惩罚，评奖的绝对平均，皓首昏目又升迁无术的小官员。几乎令人作呕的公共澡池，留声机似的模范班主任，无一不叫人哭笑不得。人人都有气，又都个个蝼蚁般在狭窄的天地中你挤我拱。只有在丁大爷烧自家棉花、知识分子侯玉峰被逼寻衅打架而见血，才稍微有点痛快的渲泄，否则就得慢慢憋死，要么精神“失常”。连带“他有什么病？”隐喻似的标题让人看到，“文革”十年愚昧的偏执、疯狂的病态，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导入金属般闪光的冷漠与热血动物被压抑的骚动，她的这种尝试成功与否，值得一议。

——柯宋

烟头燃透了外裤、棉毛裤、内裤，灼痛了他的胯部。胡立川这才意识到，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燃着的烟头，装进了裤袋。他的眼睛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事儿却不是他的眼睛告诉他的，而是他的胯部。他的眼睛刚才失了职，走了神儿。现在他的眼睛急急地投向痰盂。奇怪，钱包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文不名了。

这可真是了了他的命。谁也不能断定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胡立川连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了。

机票上明明写着十点起飞，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起飞？胡立川到值班室去问过。如果不问，可能还不会发生把钱包扔进痰盂，把烟头装进裤兜里的事。

十点到十二点之间，胡立川绕着候机室转了五个圈。仔细查看过一百几十张乘客的面孔，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猜测着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那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这几乎成了胡立川的嗜好，胡立川的习惯，胡立川的消遣。要不，一个医生下班之后怎么办？

胡立川认为，只要认真地检查，人人都有病。只不过不到要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引起注意。就是死（除了被枪毙）也会死得稀里糊涂，不知道因为什么而死。

一百几十张面孔相似得难以区分。个个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麻木的状况，即使恐怖分子扔颗炸弹，也不会有所改变。

再看看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大致相同。同样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同样的蓝、白、红尼龙线编织的轻便包，同样的黄色人造革公文包，同样的网兜里，装着G市的桔子和香蕉。桔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角，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元。

一百几十张面孔，没有一张因飞机不按时起飞，显出过烦躁、焦急、疑惑、气愤。好象他们并不急着上这儿，或是上那儿。

也许因为老是站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座位。便打算永远地坐下去，被一个座位融化了，粘住了，消磨了。除了这个座位，世界上既没有工、农、商、学、兵，也没有吃、喝、拉、撒、睡。

至关重要是桔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角，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元。可是因为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香蕉和桔子正在无谓和无辜地腐烂。空气里弥漫着香蕉腐烂的甜苦味儿，和桔子腐烂的酸苦味儿。没有人注意到五角和一元的便宜正在渐渐地变质，却因已得到过这便宜而熨贴不已。

胡立川想，如果这一百几十个人生病，恐怕也只能生同一种病。想到这里，他的全身的皮肤突然变硬。他怕，怕这时地球会咧开它的大嘴，把坐在这里的人，吞进它无法量

出深度的肚子。胡立川巴望着赶快离开这里，双脚悬空，飞向天空。永远地、永远地飞下去，飞下去。

终于在绕第六个圈子的时候，碰上了一张可以显出某种情绪的面孔。这是一张女人的面孔。“咱们应该去问问值班室，飞机为什么不按时起飞？”她说。向他说。除了向他，还能向谁？就象马对马，狮子对狮子，麋鹿对麋鹿说话一样。难道还用得着谁给它们互相介绍一下吗？比方天底下的狗，或猫，或鸟儿，或虎们对话的时候，是用不着译员的。

值班室的人说：“我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值班员想。难道候机室那一百几十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吗？“你们为什么麻木不仁、听天由命地坐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问问，为什么飞机不能按时起飞？”

不能按时起飞就是不能按时起飞，就是那一百几十个人麻木不仁、听天由命地坐在那里，既不烦躁，也不焦急，也不疑惑，也不气愤一样。

胡立川只好重新坐下，象坐在枯井里。四面是又高又陡，没有棱角，无处可以抓挠的黄土。无处。

就在这个时候，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烟头装进了裤袋。

胡立川无论如何猜不出是谁从痰盂里捞走了他的钱包。他又绕着候机室走了一圈。他不能想象，这似听非听，似见非见，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人群中，会有人看见痰盂里的钱包，并且懂得把它捞走。

是谁呢，实在看不出，也猜不出。象那古老的传说一样，青蛙、蜥蜴、石头、花草等等全可以幻化成人，在干尽人所无能为力的事情之后，又幻化成青蛙、蜥蜴、石头、花草等等。

二

问题变得又复杂，又简单。

问题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经过区、市各级医院的检查，丁小丽的处女膜，仍旧安然地长在它该长的地方。

这说明新婚之夜，她丈夫压根儿没把她怎么着，如此这般，丁小丽又值钱了；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从小淫妇，变成了节妇烈女；

如此这般，她丈夫又从法院撤回了离婚起诉；

如此这般，丁小丽的丈夫又爱丁小丽了。“我从来没有象爱你这样爱过别人。”他说。现在小说、电影、电视里的人常讲这句话。早先只有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电视里的人才说，现在中国小说，中国电影，中国电视里的人也说了。

如此这般，他那玩艺儿很可能是纸糊的，或者象音盲一样，分不清 1、2、3、4、5

.....

如此这般，他那医学学士的证书狗屁也不能证明：

如此这般……

她究竟是丁小丽，还是处女膜？

他究竟是想娶丁小丽，还是想娶丁小丽的处女膜？

他爱的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丁小丽糊涂了。

天气很冷。丁小丽把盖在身上的棉大衣往上拉了拉。棉大衣很重，从医院开张以来，二十多年也没拆洗过，上面的灰尘恐怕就有几斤重。瞌睡懵懂之中，丁小丽觉得自己正在变大，变薄，变成一张很大、很大的处女膜。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她想应该拿把手术刀来，把它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保证一吹就破。干这个买卖准能发财，离婚率也会下降。道德维持委员会准会嘉奖那些女人，发给她们奖金或奖状，只是现在不兴立贞节牌坊了。

嫂子来信说，爹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抠娘的脚心儿，还趴人家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丁小丽不信。不愿意信。

丁大爷租的是个体联运公司丁大力的拖拉机。丁大力就是丁小丽的哥，丁大爷的儿。

拖拉机一步一个响屁，往收购站去了。

一步一个响屁，排场极了。联运公司的经理丁大力，穿着中长纤维面料的西装。灰色儿，夹着细细的红道儿。

这样的收成，这样的棉花，哎，不该排场排场吗？

农民富起来了。

丁大力本来打算对折收费，但是老婆不同意。“七五折，已经是蚀了血本的价儿啦。”丁大爷陷在棉花垛里，盘算着刨去各项开支，净赚多少。丁大爷不会打算盘，除了票子上的字码，也不认识别的字。但是大大小小的账目，心里却盘算得清清楚楚。在丁大爷看来，天底下最赏心的事，就是盘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照比这件事，入洞房都算不了什么。

那时候，有个汉子躺在老槐树下睡觉。老槐树长在一片靠大路的坡地上。一半死了，一半活着。他张着嘴，仰面朝天地睡着。屁股肥大的苍蝇，在他的嘴边爬上爬出，只要嗓子里喷出一声鼾的时候，才懒懒地飞起，低低地绕着圈子，重又落下。

拖拉机的响屁，震得地皮发颤。把睡着的汉子震醒了。他坐了起来，倚着老槐树发怔。蓝的卡的军便服敞开着，鲜红的球衣直卷到胳肢窝底下，袒露着没有一点肥膘的肚子，和往外鼓着肚脐眼儿。可是他的眼神儿松着，浑身的肉也松着。

他用巴掌抹了一下脸，朝一走一哆嗦的拖拉机望去，咧嘴笑了——那家伙肚胀呢，一步一个响屁。它有病，病得不轻。

拖拉机一歪一扭地走远了。屁股后面，冒着一股股的黑烟，乌贼一样。

汉子扭过头，望着天。望着、望着，脑袋一垂，下巴抵着胸脯，又睡着了。

丁大爷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唱着小曲儿往家走。河北梆子，《秦雪梅吊孝》。

痛快。要是解放前，能这么痛快吗？

他一把火把棉花烧。谁能把他怎么着？丁大爷背着手儿，一面迈着他的小短腿，一面豪迈地晃着脑袋。

一等花。能有错儿吗？火苗窜得多高哇。烤了他一身汗。明明地晃着他的脸。

丁大爷舍不得住店。棉花垛里挺暖和。谁知道突然下了场雨呢？棉花一点没湿着，用塑料布盖着。丁大爷就是对自己的儿子、闺女、也没这么周到、仔细、耐心。就是秋天的雨，凉气儿往骨头里去，弄得丁大爷浑身骨头发紧。

他舍不得下小馆，净啃干火烧。

谁知道要等上三天呢？

等到第四天再去住店、下小馆……丁大爷盘算了一下，何必呢，再挺一挺就过去了。

比丁大爷后来的，都过完秤，走了。

丁大爷太机灵。他打哦出来了，送两瓶二锅头，先过秤。送四瓶二锅头，三等头就是二等花，二等花就是一等花。

“送吧。送了就能早过秤，卖完了好回家。”听见丁大爷的筋骨一伸胳膊、一踹腿儿就咋吧、咋吧地响，去收购站卖棉花的人，全这么开导他。

“这是谁的章法？”

丁大爷太糊涂，他不该这么说。不该这么问。一问，人家就说了：“什么时候有空儿，什么时候就给称。”人家没说不给称。人家说有空儿就给称。

“呸——，我求着你了。”

几天的工夫，丁大爷不知怎么就攒了一股邪劲儿。他一把火把棉花烧了。就在收购站里烧的。县城里翻了天，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看烧棉花去哟——，看烧棉花去哟——。”看热闹的势头有增无减，连城关外的人也陆陆续续往收购站跑。县武装部长嚷嚷着：“让开，让开，水来了，水来了。”硬是连个缝儿也撬不开。人们象箍水桶似地箍着那堆火，而且越箍越紧。县委里的秘书们一替一换地摇着电话机，把放电话机的桌子都给摇塌了。

丁大爷此时却已走在回家的小路上，管自地唱着小曲儿。比老娘儿哭丧还尖峭，还花哨。

再不用为住不住小店，下不下小馆费心思了。不管怎么着，不管是谁，开小店的、开小馆的、过秤的，谁也别再想拿捏他，他解放了，自由了。谁也别想从他那儿捞到什么便宜。他没吃亏，他的便宜没让外人占了去。丁大爷心里踏实了。

那时候，躺在老槐树下睡觉的汉子醒了。还倚着老槐树坐着。每隔半袋烟的工夫，就仰着脖子、朝着天，“嗽——”地一叫。声音传出二里地去。他的眼神紧着，浑身的肉也紧着。那一嗓子，又敞亮又嘶哑，又鲜活又死气。又欢快又凄怆，又暖和又苍凉。似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又耗尽了最后一力气。

明年要旱呐，丁大爷想。

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丁小丽要离婚了。

如果这般，她是被验过了。就象从屠宰场出来的生猪，经过检验之后，往大白屁股上盖个蓝戳；

如此这般，她过了一堂又一堂，这个摸了那个摸。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桃，也经不住这么问，这么摸。这么问下来，这么摸下来，鲜桃也得变成烂桃。直到现在，不论什么时候，丁小丽都觉得她还叉开两腿，躺在妇科检查床上，不论谁从这儿走过，都得往里看上一眼。你让一个人看了，就得让其他九十九个人看。丁小丽不能不让人家看，因为这

是判断这种问题最简便、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办法。

如此这般，怀疑她的人就越来越多。

如此这般，她如何向老家的人交代？尤其是她爹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抠娘的脚心儿，趴人家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一个女人，这样轰轰烈烈了一番之后，能不提出离婚吗？如果不提出离婚，也太对不起自己的处女膜了。

三

这一架早就该打了。晚打不如早打。不打不如经常打。

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排泄。你叫它排遣也可以。如果小木匠刚住进这个宿舍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的关系可能比现在友好得多。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抑制。如果他们刚住进这个宿舍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身上种种不利于正常生活、思索的迹象，可能就会愈演愈烈。

打架的理由很简单。

侯玉峰在手术台以及观察室连轴转了三十多个小时之后，需要休息。或是为了下一个手术，需要养精蓄锐。或是需要潜下心来攻读一段文献……

小木匠需要为哥们儿、姐们儿打家具。现在则是为自己打。家具店里，一套中看不中用的组合家具，已经卖到一千八百元了。他比不上那些走街串巷的个体木匠，一个月怎么也能弄个五、六百。行政处要不哄着他——打家具的工具、钉子、合页、三合板、木料、乳胶、清漆、染料等等全是公家的——他早就干个体去了。

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喀哧、喀哧，小木匠来回地锯着侯玉峰的骨头；

砰、砰、砰、砰，小木匠的凿子，撬着侯玉峰的脑壳；

沙沙啦、沙沙啦，小木匠的砂纸，打磨着侯玉峰的神经，每根神经上都打磨出了毛刺，象毛线一样；

嚓——嚓，嚓——嚓，小木匠的刨子，刨着侯玉峰的肌肉……

“睡不睡觉？那是你不困。”小木匠说。

侯玉峰找了党支部书记八次，要求调换宿舍。支部书记就给行政处打了八次电话。

“怎么调？这样的情况多着呢，我们了解得不比你少。”行政处说。

“把工作性质相近的同志。调到一个宿舍里去嘛。”支部书记说。

“那也会有今天你上夜班，他不上夜班；明天他上夜班。你不上夜班的问题。或者，这个不愿意从三楼调到二楼。那个不愿意从南房调到北房；或者这个看那个不顺眼，那个看这个不顺眼……”

实话。合情合理的实话。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办法解决。”

支部书记不相信天底下有解决不了的事。何况医院里还有一个严密而完全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在各级领导向小木匠做完思想政治工作之后，小木匠说：“嘿——告到党委去了。老子不是党员，这辈子也不打算入党。甭给我来这个，没用。”

“什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把他怎么了，啊？你们倒是说说。”

党的领导，面面相觑：小木匠到底把侯玉峰怎么了？

“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呀。别以为我不懂，少拿这个唬我。让大家听听，睡不着觉算什么病？知识分子个个邪乎得象小娘们儿。呸，他还压抑了我呢，让我活得不自在。”

睡不着觉确实不是病。但是，渐渐地，只要想起，或提起“睡觉”问题，侯玉峰的两眼，就会越来越邪乎地放出热而乱的光。

侯玉峰不明白，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他非住在这间房子里不可。为什么他恨得想把这间房子咬成两瓣，可一到晚上，他又得乖乖地回到这间屋子里去。

谁在后头，用鞭子赶他了吗？没有。谁在前面拽他了吗？没有。或者里面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在等着他？没有。那为什么他那么恨它，而又不能离开它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压迫他？或是在诱惑他？

他设想过种种的方案，企图逃脱这种压迫。

和隔壁的内科大夫结婚吧。她准愿意。因为睡觉问题，已经象瘟疫一样，蔓延了这栋单身宿舍，不，这个拼盘儿，这盆杂烩菜。这么一来。不但解决他的苦恼，也解决了她的苦恼。对了，把这盘拼盘儿，重新凑凑。小肚和小肚，松花蛋和松花蛋，熏鱼和熏鱼，酱鸭和酱鸭凑一块儿，别那么插花着摆。可是这么一来，行政处不得拿出更多的房子来吗？如果能拿出那么多房子，他也就不必结婚了。谁敢和那样的女人结婚呢？

在省科协全体委员的会议上，新当选的主席因长期患精神病不能到会，由其他同志代致答词：“同志们，感谢大家推选我为省科协主席。我自知各方面的修养、学识、能力都很差，今后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为完成大家的委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她竟然在答词尚未致完的时候，便在台下大声提出：“既然因长期患病不能到会，这篇答词，显然是事先写好的喽。请问，新当选的主席，怎么知道自己一定当选呢？既然患的是精神病，请问，又怎样写出这样一篇条理清楚的答词……”

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新当选的主席有精神病，有关她神经不够正常的说法，却闹得满城风雨。跟一个神经不够正常的女人结婚，不是自找倒霉吗？

再不就插根草棍，往闹市上一站，卖去。嘴里一定得嚷嚷着：“哎，不管老的、少的、瞎的、瘸的、打嗝的、放屁的、说梦话的、也不分国籍、性别（包括同性恋者），只要给一间房子，咱们马上结婚。”

这个办法准行。现在很多有房子，工资高，学历高的女人嫁不出去，外国也一样。象他这样有学历、有技术，魁魁伟伟，有模有样的男人，如果不是急着离开这个集体宿舍，还不是由着他的性儿挑？

这办法准不行。没等他把自己卖出去，有关部门就得把他拘留起来，给他定个扰乱治

安罪。

事实上侯玉峰怕结婚。怕奶瓶子、怕尿布、怕买菜、怕扛煤气罐、怕负责任。其实侯玉峰又极其地负责任，如果一个本是自由自在的好女人，终有一天变成他的妻子，从此就开始为买不到治疗小儿湿疹的特效药，或是酸奶里有大肠杆菌而发愁；为果脯上有肝炎病毒，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而担忧；为孩子入托儿所走后门而殚精竭虑；为没钱请阿姨，下了班之后还得一面哄孩子，一面做饭累得死去活来……那，那他还算什么男人呢？如果社会不能在这方面给一个女人提供最低的便利和保证，他要是起码的良心，就不应该把一个自由自在的女人，拖进这个苦海。劳心又劳力的女人，总是过量地白了头发，凋谢了青春。

或者干脆拿斧子把这栋楼劈了，或是放把火烧了。那样他和小木匠不散伙也得散伙……这个方案既可怕又有无穷的诱惑。能这么想，没准有一天就可能这么做。谁能担保自己的理智永远清醒呢？疯子和常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吗？就象洋地黄的治疗量和中毒量相差无几一样。

……

小木匠的刨子正好砸在侯玉峰的额头上，顿时他就鲜血直流。好痛快。好舒服。侯玉峰早就期待着见红的这一天。不光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骚乱，就是他们家传了一辈又一辈的窝囊气，似乎全从这破了口的血管中流出来了。

他的高祖父，前清的一位举人；

他的祖父，一位中学校长；

他的父亲，一个机关里的小职员……

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他们怎么拉屎，怎么放屁，怎么和女人睡觉，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笑，怎么当官儿，怎么上朝……无一不是想了又想，猜了又猜：别人会怎么说？别人会怎么看？结果会怎么样？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过他的高祖父、祖父，还能象阿Q一样，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理论中，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平衡。其实他们不过是人家豢养着的一只猫，或一只狗。没听见人家说嘛，“养士”、“养士”。高兴的时候，摩挲、摩挲你。不高兴的时候，就给你一脚，把你踹到一边儿去。“养”，从来就是一个包含着依从关系的动词。但是人家到底还给你起了个让你接受得了的名字，“士”。明明拿你当狗，却不叫你做狗。

变成“团结、教育、改造”之后，干脆告诉你，你就是狗。是狗都长尾巴。狗长尾巴干什么使？不是摇尾乞怜就是夹进裆里。摇尾巴吧，狗。把尾巴夹起来吧，狗。

侯玉峰额头上的血，依旧汨汨地流着。他听见他的血在唱：“杀人啦——，“杀人啦——”他不怕，一点也不怕。他攥紧了自己的拳头，向小木匠身上奔去。扑、扑、扑、扑，象拳击运动员训练时夯沙袋一样。不紧不慢，一拳是一拳。

这一拳，为了他的高祖；

这一拳，为了他的祖父；

这一拳，为了他的父亲；

这一拳，为了他自己；

这一拳，为了千千万万条狗……

他快乐。他的血仍在喊：“杀人啦——，“杀人啦——”

他释然了。他彻悟了。

那一夜，侯玉峰睡得特别香。

四

胡立川被弹出去了。他听风弹棉花的弓子在响。嗡嗡，嘣嘣。

咔嚓，胡立川五体投地了。在尾骨尚未来得及疼痛的一瞬间，水泥地面，就是三伏天里，一块北洋牌的洋砖。

有一阵子胡立川不知置身何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在这儿干什么？

他好象正在考虑要不要填那张干部履历表。谁的老底儿，不在人事处的档案里装着？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五岁那年，你偷吃过邻家树上的梨；你爹镶过两颗假牙，那两颗假牙用的黄金，还是白金？什么成色？什么份量？或什么金都不是，而是不锈钢；你父亲开豆浆铺的时候，每天往豆浆里兑一桶水……诸如此类，档案里全都写得一清二楚。可是你还得隔长补短地，一本一本地填干部履历表。以前填的那些表，可能让谁当葱花烙饼吃了。那滋味儿一定不错。

他怎么会躺在路上呢？

一块巨石横在马路中心窃笑。刚才决没有这块石头，决没有。它一定是突然从地里蹦出来的。

古生物过早地，将用来确定周围世界立体概念的第三只眼退化了。

这时胡立川口袋里的呼叫器响了。“胡立川大夫，胡立川大夫，请速到病房里来。”

啊，对。他正往医院里赶去。呼叫器还是洋货，但只能做定距离内的接受，而不能进行对话。因此胡立川不知道是哪一床病人出了问题，以及出了什么问题。

世界上的事情，其实全是偶然造成的。

恰巧他预感着今天要出事，一直开着呼叫器；

呼叫器今天的效果恰巧很好，听上去很清晰；

胡立川恰巧有辆自行车；

自行车恰巧没有摔坏；

他恰巧住得离医院只有两站地；

病人恰巧——恰巧还没按照常规，送到太平间去……

“爹，还烧吗？”

“烧。”黄老头说。黄家有的是钱。人民币加兑换券。儿子每月工资小一千，他自己每月能赚三百。

除了官衔没有买到，凡是中国有的，他们家差不多全买到了。

官衔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汽车、房子、电话加权力（利）吗？给三亲六故安插个好

差事什么的。这些，只要有钱，全能办到。

说到好差事，不就是吃香喝辣，或是出洋去么？凭儿子的手艺，没准也能出洋。烤鸭店、北京饭店几个师傅就都出过洋。

拾元钱一张的票子，又点着了。票子藏在黄老头贴身的、大裤衩的口袋里。摸上去潮乎乎的，还带着他身上的汗酸味儿。这两天黄老头出汗太多，着急急的。

燃着的钞票，在绿草上伸缩着不长的火舌。钞票底下的几茎细草，疼得嘶嘶地尖叫，迅速地，缩着它们的细茎。

黄老头可不心疼钱。弄套房子，还送了个大彩电呢，一千八百多元。难道黄家这根，还不值个彩电？

火苗很小，只能照见黄老头的手，和他们父子二人，朝下伏着的脸。

在微弱的光亮里，黄老头手上的每条纹路，象一张张咧着的嘴。里面满含着钉鞋时，从各种鞋子上飞扬起来，又被这些纹路吃进去的尘埃。黄老头的指甲又黄、又厚、又长、又硬，捏过千千万万只钉鞋用的铁钉。他很少砸歪过钉子，总是一锤下去，钉子就象旗杆那样，端端正正地楔进橡胶的、或是布的、或是牛皮的鞋掌里去。

补鞋也是艺术，就跟作家写小说一样，凭的是感觉。感觉好，基本上就差不多。比方下锤子时的分寸感，以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那两个又黄、又厚、又长、又硬的指甲的配合默契。

谁说指甲没有知觉？此时黄老头的指甲触在一张张大团结上，有如拉着纤绳，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他是逆水行舟过险滩啊，那船上载着他的孙子呢。

黄老头脸上的神情是凝重壮烈，不惜牺牲的。一线光亮从低处射上来，平时他那慈祥的脸庞，此时却凹凸出一块块不平的肌肉。而这一块块肌肉，又被血管里奔腾着、呐喊着的血，鼓得一涨一跳，一涨一跳。

他们身后，那一团光亮照不到的地方，是无际的、其重无比的夜空，和那栋神秘的楼，人们叫做医院的地方。黄老头之所以觉得它神秘，是因为死人进去也许就活了，活人进去也许就死了，象那神秘的佛龛，给人以未知。楼里的灯，也如佛龛前的油灯，不明不暗的亮着。此刻黄家的那根独苗，就随着这盏油灯飘忽着。

“你过去看看。”黄老头吩咐着儿子。

儿子重又趴到病房的窗台上守着去了。

黄老头的两肘和两膝，在草地上拧来拧去。似乎这块土地让他那么不自在，不舒服，怎么呆着也不合适。他的嘴唇，飞快地噙动着。向各方的神灵，屈死的冤鬼叩头许愿，一一打点。

“爹。”儿子惊喊道。

黄老头慌忙翻身立起，扑向水泥窗台。他的两肘和两膝上，打补钉似地染着青草的绿色汁液，象外国最时髦的猎装。

刚才还忙得团团转的大夫、护士，此时都垂手而立。只剩下一个大夫，还在一下下地按着孙子的小胸脯，就象给自行车打气似的。

使劲呀，你倒是使劲呀。黄老头急得直抠自己的手心，恨不得自己上去按去。

别，别。别太使劲，孙子痛哇。黄老头又想。

不行啦，不行啦——

黄家的这条血脉，眼瞅就要断在这儿啦。他做过什么丧天害理的事吗？没有，就是陷害忠良的秦桧、严嵩，哪一个也没断子孙啊。老天爷难道也是看人下菜碟？

天神地神，大鬼小鬼，或架祥云，或乘白烟儿，明明都请来了，个个都念他一片诚心，一百张大团结全收走啦，他亲眼看见的。那些票子的白灰，飘呀飘地，旋呀旋地，不一会儿全都没有了影儿。

一个大彩电，还能换套房子呢。

早先谁给送子娘娘许愿，不给你个儿子，也给你个闺女。现如今，连神鬼都不在了，吃也白吃，拿也白拿。

老黄头不忍，也不敢再看下去，把脚跟落在了地上。他喘息不已，膝头发软。他的腿肚子因为长时间地、用力地踮着脚尖而哆嗦，而转筋。他把身体贴在水泥墙上，靠那堵不给人一点温暖和安慰的墙，支撑着自己。

“爹。”儿子又叫了。

黄老头禁不住又用两只手，紧紧地抠住窗檐，使劲地踮起脚尖。

只见又进来一个人。此人又高又瘦，晃晃悠悠。他的面孔，在日光灯的照射下，白里透黄。

又是一个“瓜菜代”。黄老头想。“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大夫、护士，怎么一个个还是没吃饱饭的样子。孩子的命交给这些人，难怪好不了，他们自己就缺少活气儿。

这人是位大夫，好大夫。黄老头知道。

医院里的大夫、护士，黄老头差不多都认识。他那补鞋的摊儿，已然在这医院的门口，撑了二十多年。医院里的大夫、护士，一代又一代，全在他的摊上补过鞋。他补的鞋真结实。从赚钱这头来说，这么干太傻。从黄老头的脸面来说，这就是他的光彩。至少在这附近的几条街上，人们提起来的时候，黄老头这辈子亮过。

好在人人都希望一双鞋能穿上几辈子。不穿上几辈子，至少能穿上一辈子。鞋跟歪了换鞋跟儿，前掌穿了换前掌，鞋绊儿断了接鞋绊儿，鞋面儿裂了补鞋面儿。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说十亿人，人人穿皮鞋，哪怕有一半人穿皮鞋，补鞋这个行当，就会越来越兴旺发达。

可以送太平间了。

一般情况下，脑缺氧三至五分钟就不可逆转了。现在心脏停跳已经十二分钟。

五岁，也许这样更好。

没有，没有希望了。瞳孔散大到边，毫无对光反射。

如果算做一次病理解剖呢？谁能担保不会出现一个偶然呢？

“准备开胸包”。胡立川一面指挥护士往患儿身上洒碘酒，一面穿隔离衣，戴手套。

嘭、嘭、嘭、嘭。黄老头使劲敲着窗棂。窗户象发生地震似地哗哗地响着，他手骨节上的肉，全在窗棂上磕破了，他却全然不觉。

“大夫，大夫，我们祖宗八代全给您叩头啦。”

外头是一团漆黑的夜，屋子里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黄老头和他儿子的脑袋，齐茬茬

地平着窗台，象是两颗搁在窗台上的人头。

胡立川觉得象是见了鬼。“赶快把窗帘拉上。”他说。

“爹，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得，那大夫简直象……”儿子嗫嚅地说。他因而不大相信他的儿子已经脱离险境，但他不敢说破。从小他就知道，老人们忌讳把不吉利的征兆说破，好象这样就能将厄运躲过。不这样哄着自己，那日子还能过下去么？

可是躲就能躲过去吗？他到底比上一代人进步。他不赞赏这种被动的态度，而更加注重实际。万一孩子不行了，他决心再生一个。虽说他已经为生了两个孩子，降了两级工资，还挨了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不过他得了一个儿子，这才是顶要紧的。

他本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只知道好好地干活，好好地过日子，人活一世不易。除此之外，绝无非分之想。要不，象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呢？这就跟唱戏一样，生、旦、净、末、丑什么角儿都得有。党里头也得有真卖力气的人。只是他入党的时候，党章上还没说不让生两个孩子。谁曾想后来为生两个孩子，受到党内的处分呢？现在添上了没有？他也不清楚。党章来回地变了好几个个儿。说变了，又好象没变。说没变，又好象变了。在他脑子里，什么文件、条文、精神、理论。全都一勺烩了。

谁让他是男人呢？是男人就得娶妻，娶妻就得生子。

自从降工资，受处分以来，他的脑袋变得清楚起来。那些老菜帮，哪个不是五、六、七、八个？等到他们生够了，那玩艺儿不顶用了，到了他这儿，俩都不行了。那档子事不是如此？前头干够了，捞足了，就该卡后头的了。“不逮偷牛的，专逮拔橛的。”

为这，他辞去了国营饭店里的差事。应聘进了合资经营的金龙大饭店。转眼之间工资翻了两番。降那两级，早捞回来了。至于党内警告处分……金龙大饭店，从来不过组织生活。

儿子恰恰和黄老头想到一块去了。黄老头心里更加发毛。“胡说些什么。”他大声吼着儿子给自己壮胆儿。听说过，医院里有间院子，专门装死人。

黄老头强逼着自己，把向暗处乱溜的目光捆起来。可是很难。

就在这时候，有个影子，有个似乎是深绿、血红、黑灰的影子，从儿子身后潜了起来。黄老头觉得背上的汗毛，一刹那间长了一尺多长，在背上拂来拂去。他那有些失聪的耳朵，此时灵敏得象他家里那只猫。他的耳轮也象猫那样灵活地朝四下转动着。他的身躯，顷刻之间也变得象猫那样轻盈，随时准备跃离此地。

“喂”没有揪自己的头发，也没有撕自己的衣服，或是捶自己的胸，或是顿自己的足，或是让二锅头烧红自己的眼睛，或是咔嚓一声劈下自己的脑袋……“喂”只是顺着墙根儿，急步地来回溜着。就跟一头受了惊的牛，或骡子，刚刚让人圈回圈里，来回地蹭着圈上的栏杆绕圈儿。

“天爷呀，我是畜牲，我不是人。不是。”“喂”的肠子、肚子、腰子、“喂”的心、肚、肺说。在“喂”的躯壳里说。“喂”不说。不要说见白昼、见太阳、见人……“喂”连说的脸、连忏悔的脸都没有了。

院墙旁的一丛矮树，用树枝猛地抽了一下他的脸。不疼。“喂”的脸上，长着一层大大小小，没有知觉的赘疣。象一大捧熟了的葡萄。

接着，“喂”吭哧一声，往地上一倒。象倒下个装满粮食的口袋。从手掌、双肘、

两膝传来一阵象是爱抚的疼痛。这杂草丛生的树丛，象是一处港湾。从楼里扔出来的破瓶子、空罐头、烂纸片儿、塑料口袋等等，在风中恣意地飞舞倦了以后，就在这里停泊。“喂”也在这里仰面朝天地躺着，用那象是把眼珠和眼白捣碎之后，又在里面搅和个乱七八糟的眼睛，凝视着夜空。今天没有月亮。他见不得太阳，便希冀着太阳的影子。

“我是个畜牲。”“喂”想。已经有好多年了，他老觉得屁股上搁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不论他嗅树叶，或是青草，总能嗅出一股蒜泥、猪头肉、二锅头的味道。他禁不住侧过头去，咬了一口青草，在嘴里嚼着。嚼着，嚼着，果然嚼出来一股蒜泥拌黄瓜的青味儿。

当女儿第一次裸着和“喂”一样高大、健壮的身躯，向“喂”扑来的时候，他不但以为老婆重新复活，还从女儿那裸露的肉体上，嗅出他老婆向上特有的生殖的气味，只有野兽、畜生才会发出这样的气味。也只有野兽、畜生，才能嗅出这种气味。和他老婆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人人都得变成野兽、畜生。

“喂”当时恐怖至极，凶狠地抽打了女儿一顿。可是她什么也不明白。她痴、她呆、她傻。天爷呀，为什么不让她的肉体，也象她的脑子那样，变成一堆豆腐渣呢？那就成全她啦。作孽的天爷呀，我×你妈啦。

女儿成天烦躁不安的叫着，笑着，扭着。象一头发了情的母牛那样大张着鼻孔。那鼻孔扇乎着、嗅着，而终于在那个晚上，扑向了“喂”。

那时他还不叫“喂”。

他肮脏得令人恐怖、作呕的一生，本没什么大了的缘由，完全是从那一脸如紫葡萄一般的赘疣开始的。

哪个女人会爱这张脸？会亲这张脸？会和这张脸同床共枕？

他恨所有的女人。她们一看见他，就贱声贱气地尖叫起来。她们全是贱货。而他的肉体，却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作贱她们那卑贱而淫荡的肉体。

她们越是贱声贱气地叫喊，他就越是把脸朝着她们，他的脸撬得她们到处乱跑。

后来，他拣到了这个没人要的疯女人。拣。

那时，她象球一样，从这一个释放的劳改犯手里，传到那一个小偷的手里；又从那一个小偷手里，传到那一个流氓的手里……同样，没有一点碴子的女人，谁能嫁给她们呢？对女人的渴望，也并不因为他们释放的劳改犯、小偷、流氓，象剥夺政治权利那样，干净利索地消亡。可是他觉得她比那些贱声贱气的女人，干净多了。

那时，她还不太疯。白天坐在门坎上，安安静静地望着往来的人等傻笑，再不就愣愣地瞅着地上的阴影，一点点地跟着太阳挪窝。要是阴天下雨，不出太阳，就靠着窗子，数那从房檐上掉下来的雨滴，每次数到五，再从一开始。

只有到了晚上——，晚上才看出她的疯来。不知那些释放的劳改犯、小偷、流氓怎么把她整治的。

当她在黑暗中，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无时无晌地厮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她不是人，而是靠吮吸男人阳气以还阳的女鬼。每到天亮，他都面色如土，象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他盘腿坐在床上，久久地审视着还在沉睡的她。那是一张纵欲的脸。嘴唇、眼下的肉囊，鼻翼两侧的部位，胀胀发亮。疏朗的眉毛，一根根怕冷似地立着。眼睛的四周，漾着一圈黑晕，皮肤干裂，没有光泽，长满了红色的斑点……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她是让那

些畜生给调理坏啦。她就是这么疯的。她就疯在这个上头。完了。人一走上这条道儿，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她怀孕了。一个拉排子车的，怎么能懂得优生学，怎么能懂得疯子是不应生小孩的呢？

生完孩子，她又回到那窝人里去啦。象一只不着家，也不需要家的野猫。怎么打也不行……突然，她死了。

怎么打也不行……现在轮到他女儿了。

“喂”想，他们都疯了，他们全家，好象有谁在他肚子上踹了一脚，从他五脏六腑里蹦出声“欧——”说不上是嚎，是哭，是笑。

“喂”说不清是可怜女儿，还是可怜自己，或者禁不住煎熬而终于接受了女儿扑过来的肉体。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没有一个男人会娶她，会和她同床共枕的。

畜生，他们是一窝畜生。“喂”想。他弄不清女儿怀里抱着的婴儿，究竟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外孙女。

“我和我爸爸生的。”女儿抱着那婴儿，嘻嘻地逢人便说。傻子是不知道羞耻的，这是傻子的福气。

她逢人便说。但是党委书记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医院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看太平间的人。这活儿工资又低，又晦气。

只是人们从来不和他讲话。病房里来送尸体的人，或是财务科发工资的人，叫他“喂”。

“喂”不怕尸体。因为他们不看他。他们不会看了，他们想看也不能看了。他们也不叫他“喂”。那些尸体，比大街上不知道他的故事的人还可亲。想到有一天，他也会向在太平间里，什么都不知道了，“喂”满意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这是他唯一的盼头了。想到这里，“喂”的血就凉下来一点。他听见他们不再象刚才那样汩汩地泛着泡沫，不再象刚才哗哗地响得那么厉害。

太平间是“喂”的天堂。他该回太平间去了。快有半夜两点了吧？“喂”想。该死的人，多半在这个时候上路。“喂”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大楼走去。猛然瞧见一楼窗下有两个影子，便折身往回走另一条道儿，不料一脚踩碎了一个玻璃瓶子。

黄老头紧绷绷的神经，和玻璃瓶子，一块断裂了。他从腔子里抽出一声抑制了很久的嚎叫，揪着儿子，撒腿就跑。

楼上，几房窗户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有人惊咋地问：“出了什么事？”

五

×年×月×日

风从破了的玻璃窗里吹进来，很快就吹凉了冒着热气儿的粥。大家坐在“磨剪子嘞